

中国思想史 论集续篇

徐复观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徐复观 著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 徐复观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6

ISBN 7 - 80678 - 147 - 1

I. 中... II. 徐... III. 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358 号
图字:09 - 2004 - 001 号

策 划 彼岸出版策划室

(汪宇)

责任编辑 金良年

封面设计 范乐春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徐复观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 × 965 1/16 印张 27 字数 396,000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 - 80678 - 147 - 1 / B · 8

定价 45.00 元

前言

去岁十一月间,复观先生自港来函,谓三十年来所写学术论著,除出版专书者外,其单篇论文,在五十年代所作者,已印为《中国思想史论集》,由学生书局出版。六十年代以后,拟再予整理,以“续篇”为名付梓。囑询时报出版公司意见。当商诸高信疆兄伉俪,即荷承诺。乃复书先生,旋接来示,至表欣慰,并谓俟整理后约三月间交稿。盖是时先生精神充沛,体力正旺,贯注于研究学术及论衡时事,固不因宿疾未瘳而有所芥蒂也。

今岁二月五日,忽接先生快函,谓因筋骨痛急欲来台,囑代办入境证及治疗安排,经顺利完成。先生偕夫人于二月八日下午搭华航班机自港启程,余迎之于中正机场,见先生步履尚健,神态如常,惟时以手抚背,盖剧痛也。行篋殊简约,仅所携小手提箱,须臾不离,意者其中必为细软或随身用品。迨至海关检查,启而视之,则别无他物,只书稿一束而已。即《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也。

先生抵台后,即入台大医院,住九〇七病房。翌日检查,诊断为癌细胞扩散,即照钴六十。越三日,忽感足部麻木,自踵至股。二月十四日,余得电话,谓先生有事须面谈,当即赶往,先生在病榻上握余手,曰:“经询医师‘下肢麻木,是癌细胞侵入神经否’,答曰‘有此可能’。‘此项现象,将继续扩延否’,答曰‘有此可能’。恐旦夕间口不能言,爰将《思想史续篇》稿先行交代。整理工作仅及其半,余将委之于曹永洋、陈淑女诸生,并烦君作一序冠诸篇首,述其经过。”余方欲辞以不敏,先生亟止之。重以先生囑咐之殷,不敢再言。

自先生入台大医院治疗以来,瞬将两月。先生病况时有起伏,或谈笑自若,或剧痛难忍。先生谓余曰:“纵令全身麻木,但求脑子不废,仍可将沉思所得,吐而出之也。”其忧时爱国、播学传薪之志业,溢于言表。余以清人吴锡麒寿袁随园八十文中“病到难回之日,又懒升天”之句慰之(今年农历正月初三日为先生八十整寿),先生为之莞尔。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都六十万言,经时报出版公司同仁尽力编校,历时仅月余而全书杀青。以之持献于先生病榻之前,庶期先生见心血所瘁之作,得以问世,色然而喜,瞿然而愈。此则馨香祷祝者也。至于兹书内容,精深博大,

如海如渊，浅学如余者，固不敢赞一词矣。

后学杨乃藩谨记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自序

余自八岁受读以来，小有聪明而绝无志气。四十年代，始以国族之忧为忧，恒焦劳心力于无用之也，既自知非用世之才，且常念熊师十力“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深以当时学风，言西学者率浅薄无根无实，则转而以“数典诬祖”（不仅忘祖而已）为哗众取宠之资，感愤既深，故入五十年代后，乃于教学之余，奋力摸索前进，一以原始资料与逻辑为导引，以人生社会政治问题为征验。传统文化中之丑恶者，抉而去之，惟恐不尽；传统文化中之美善者，表而出之，亦惧有所夸饰。三十年之著作，可能有错误而决无矫诬，常不免于一时意气之言，要其基本动心，乃涌出于感世伤时之念，此则反躬自问，可公言之天下而无所愧怍者。然偶得摸入门径，途程尚未及千万分之一，而生命已指目可数矣。

五十年代所写学术性单篇论文，早已汇印为《中国思想史论集》。六十年代以后，积力于专书写作，亦间或写有单篇论文、附录于各专书之后，今已烦陈君淑女、曹君永洋汇编为《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其中所收孔学数文，乃写于五十年代，收入以表余之所向，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诸友之助，印行问世。老友程沧波先生题署，乐君炳南、蓝君吉富参与校对之劳，俱可感念。

《程朱异同》一文，以“为己之学”，贯通孔、孟、程、朱、陆、王学脉，老庄对知识与人生态度与儒学异，但其学问方向亦与此相通，此乃余最后体悟所到，惜得之太迟，出之太骤，今病恐将不起，以未能继续阐述为恨。

徐复观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口述于

台湾大学附属医院九〇七病室床上

烦曹君永洋记录

中国思想史论集自序之二

本书第一版早经绝版,其中有关文学方面的三篇文章,已抽出编入《中国文学论集》里面。我原来打算把《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集重新编印,将其中论政与论学的文章完全分开,而论学的文章即编入本集之内。但因许多原因,此事尚有所待。现当本集再版时,只补进两篇性质相同的文章,并另将性质不完全相同的四篇文章也一并收为附录。

在本集交付再版之前,我抽暇从头到尾看过一遍,除了看出若干错字,列为勘误表外,对内容有不甚妥当的地方,因将就原有版型的关系,不能改写,便在这里略为指出:

(1)《象山学术》一文中,“八、陆王异同”一节,我把问题处理得太简单,应完全去掉。我在《两汉思想史》写成后,对宋明理学预定要写几篇文章,以了我原来的志愿,对此问题当有进一步的交代。

(2)《〈中庸〉的地位问题》一文中的第二节,提出了五点论证,以证明《中庸》乃出现在孟子之前。现在看起来,只有将《论语》、《中庸》之“知仁勇”,与孟子之“仁义礼知”作对比之第二项证据,可坚确不移,其他四项论证则稍嫌薄弱。此一问题,须在拙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而始得到解决。近来也有人以《中庸》上有“故大德必得其位”,及“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等语,遂认定这是战国末期的“受命”及“符瑞灾异”的思想,因而认为《中庸》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我以为孔子本有大德可以受命的想法,始有《论语》上“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之言,子思遂以之立万世受命的准则。而大德受命,与战国末期所流行的由邹衍“五德运转”而来的受命,有其本质上的分别。符瑞灾异思想,源远流长,不始于战国。但战国末期所流行之符瑞灾异思想,皆征验于罕见之自然现象,无一以蓍龟为征验的,因为蓍龟在此时已极少在社会上层中应用。《中庸》则谓“见乎蓍龟”,尚保存蓍龟之神秘性,正可见其出于孟子之前。

(3)在《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谈到孔老关系的地方,不够确切。此一问题,在拙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附录一《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探讨》一文中,始有精密的考查,应以之纠正本文的错误。同时,今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授课时,曾将《庄子·天下》篇所述“老聃曰”的一段话,逐句与现行《老子》一书对照,发现无一字不是出自现行《老子》一书。是

《天下》篇成篇时,《老子》一书已开始流行。虽然其中或不免有后来附益上去的东西,但基本形态则形成于《天下》篇成篇之前,是决无可疑的。而《庄子·天下》篇,我以为是出于庄子本人之手(此另有考证)。因为以后大概没有机会专谈此一问题,故附记于此。

(4) 在《〈孟子〉知言养气章试释》一文中,我在几个地方改了几个字,列入勘误表中,希望读者在此等处,细心体察所以改动之故。

(5) 在《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中的诸问题》一文中,我对《孝经》成书的考证,认为它是出现于汉武帝、宣帝之际,这是错误的。年来我把两汉的文献完全读过一遍,发现陆贾《新语》已有两处引用到《孝经》,在文、景时代也有多人引用到。现在我认为它是出于战国中期以后,到吕不韦的门客集体写《吕氏春秋》时,它已经流行。我有关本问题考证的最大缺点,在于太注重钻材料的空隙,而忽视了广大的背景,更忽视了古代对某些事情不可能纪录得完全,因纪录得不完全而遽然断定这些纪录为伪,这是非常冒险的考证方法。有关《孝经》问题,预定还有专文谈到它,但在此文中对它内容的批评,却完全可以成立的。

我写的文章发表后,非常希望学术界能提出负责的批评,但在目前环境之下,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事,并且像陆王异同及《孝经》成书年代与孔老关系等问题,即使有人指出我的错误,我也容易找出逃避之所。在这种地方,只有靠个人不断的继续努力,并须要不把“爱假面子”当作维持自己地位的重要手段时,才会引起真正的反省,因而在学术上可以减少对天下、对后世所犯的欺枉之罪。当然,写文章的主要动机,到底是为了个人的名位,还是为了对天下、对后世的责任心,更是一个人有无反省力的决定因素。我回想到在写陆王异同和《孝经》成书年代时,多少含着有点卖弄聪明、驰骋意气的成分在里面,这是立说容易流于武断的最根本原因。我在这里特别指出,以作治学的大戒。

把含有不少错误的文章重印出来,并不是为了把它当作个人治学过程中的里程碑,而是为了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时代激流之中,以感愤的心情所写出来的,对于古人的了解,也是在时代精神启发之下,所一步一步地发掘出来的。所以我常常想到克罗齐(B. Croce)的“只有现代史”的意见,因此,在我的

每一篇文章中,似乎都含有若干有血有肉的东西在里面。而本集里,对治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的不断提出,及对于迷离惆怅的文字魔术所作的追根究底的清理,这都可给下一代有志气从事于学问的人以一点帮助。

现代特性之一,因科学、技术的飞跃进展,及国际关连的特别密切,使历史演进的速度远非过去任何时代可比,关于人自身问题的看法也像万花筒样地令人目光缭乱。最主要的是表现在西方传统价值系统的崩溃,因而有不少人主张只有科学、技术的问题,没有价值的问题,事实上则是以反价值的东西来代替人生价值。十多年来,我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持对这些时代风潮的接触,一方面坐稳自己的研究椅子,从人类的过去以展望现在与未来,认定在科学、技术之外,还要开辟人类自己的价值世界,以安顿人类自己。有些沾点西方反价值者的余沥以标新立异,并百端诬蔑我的人们,可谓尽变幻神奇的能事。但因为我从人类古老历史的残渣中,早已看过这类的脸谱和这类脸谱所担当的角色,所以从未因此而阻扰到自己努力的大方向。而这种努力的大方向,今日又正从世界各个文化园地,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形态,发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呼声,这又在说明什么呢?站在人性根源之地,以探索人类运命的前程,这与新旧中西等不相干的争论,是颇为缘远的。

一九六七年孔诞节复观记于东海大学寓庐

中国思想史论集自序之三

——我的若干断想

兹当此书发行三版补编之际,以下面曾经在《人物与思想》上刊出过的一文,作为代序。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香港“现代研究辅导中心”,把我写的各书里面提到方法的文字,抽出来汇印在一起,以为可供青年人治学的参考,并要我再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非常使我感愧的一件事。我年来所作的是有关中国思想史这一方面的工作,这里只能补充若干片断的感想。

我国过去,常有借古人几句话来讲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直到熊十力先生的体大思精的《新唯识论》,还未脱此窠臼。所以他曾告诉我:“文字借自古人,内容则是出自我自己的创造。”所以《新唯识论》只能视为熊先生个人的哲学,不能当作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典据。但在今日,我主张个人的哲学思想,和研究古人的哲学思想史,应完全分开。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万不可将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

可是,上述的简单要求,并不容易达到。我们了解古人,仅能凭借古人直接留下来的文字。朱元晦读书的精细,及态度的客观,只要看过《朱子读书法》的人,便不能不加以承认。但当他费最大精力注释《孟子》时,对《孟子》中言心、言性的地方,几乎无不颠倒,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理气的哲学横在胸中,不知不觉地便用了上去。这里便遇着一个难题,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有了哲学修养,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换位。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孔子自谓“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所谓“能言”乃由周礼上推,以言其“礼意”,但因“文献不足”,他终于不言。我读《论语》,常常是在他生命的转化中所自然流露出的“平凡中的伟大”的语言上受到感动。西方一套一套的形而上学,面对着孔子由生命转化中所流露出的语默云为,我不感到有多大意义。上面引的乃其一例。

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而我国一般知识分子所最缺乏的正是思考力,亦即是缺乏在分析综合中的辨别推理能力,连许多主张西化的人也不例外。思考力的培养,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较之纯读线装书,得来比较容易。

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剧场、两种不同的演出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的道具的比较研究。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的意义,有无现代的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去加以衡量。面对时代的巨变,西方玄学式的,与现实游离得太远的哲学思想,正受着严重的考验。我们“简易”的哲学思想,是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的发现,是否要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我非常怀疑。我们在能与西方相通的地方,可以证人心之所同;我们与西方相异的地方,或可以补西方文化之所缺。这也和我们要吸收西方所有,而为我们所没有的,以补我们之所缺,是同样的道理。做学问,只能求之于自己学术良心之所安,而不必先问西方人的能否接受;因为接受不接受,是西方人的事情。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为了充实自己),今之学者为人(做给他人看)。”今人治学的精神状态,“为人”的成分太多了。

谈到方法问题,大体上说,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由反省所集结出的方法,又可以导引治学中的操作过程。没有适当的方法,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悬空地谈方法,可以简括成几句话。可是知道了简括的几句话,并不能发生什么真正作用。方法的真正作用,乃发生于诚挚的治学精神与勤勉的治学工作之中。方法的效果,是与治学的功力成正比例。面对学问的自身而言,我还是一个幼稚园的学生,这便局限了我所提到的方法问题的价值。但我所提到的,虽各有根源,而我对它的把握,则是来自自治学过程中的触发和领悟,而不是出于抄袭、悬拟,这一点,或者勉强可以对答“现代研究辅导中心”的盛意。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于九龙寓所

目 录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序	001
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	
——《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	007
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	010
一、从文字学上看“阴阳”二字之原始意义	010
二、《诗经》中的阴阳观念	011
三、春秋时代阴阳观念之演变	012
四、春秋时代的五行观念	016
五、我对今文《尚书》在文献上的一般看法	020
六、《甘誓》的成立时代及其中的五行问题	024
七、《洪范》的成立时代及其中的五行问题	028
八、战国时代阴阳观念的演变与在《易传》中的发展	041
九、《易传》与道家的关系	047
十、战国时代五行观念的演变与邹衍	049
十一、阴阳五行的融合——从《吕氏春秋》到董仲舒	054
由《尚书·甘誓》、《洪范》诸篇的考证看有关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	
——敬答屈万里先生	061
一、治学的态度比方法更重要	061
二、历史问题应让历史自身有优先发言权	061
三、批评应从对方立论的根据下手	066
四、由铁及疆域推断《禹贡》成立的年代	069
五、有根据的判断不能称为“意必”之辞	075
六、我并没有误会屈先生的说法	078
七、应实事求是,多作反省的例证	082
与陈梦家、屈万里两先生商讨周公旦曾否践阼称王的问题	088
一、现代中国史学的反省	088
二、周公问题在历史中的演变及其重新提出	089

三、武王、成王的年龄问题	094
四、《康诰》的问题	098
五、《尚书》中《康诰》以外的有关文献	102
六、《尚书》以外的两点讨论	106
有关周公践阼称王问题的申复	111
有关周初若干史实之考证	126
引 言	126
一、西安半坡文化的启发	127
二、两个文化层的混乱	129
三、周太王接不上客省庄第二期文化	131
四、因抄材料的错误而迷失了周文化是殷文化的一支	132
五、因缺乏文献史料的了解而误解了后稷	134
六、后稷到文王的世次问题	137
七、公刘问题	138
八、太王迁豳的有关问题	139
九、姜、羌及周祖先居地问题	142
十、周与夏的关系问题	145
十一、上帝与祖宗神的问题及对傅斯年的评价	148
十二、武王伐纣的年代、兵力及八族的问题	152
十三、学术风气的问题	161
释“版本”的“本”及士礼居本《国语》辨名	164
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	171
一、有关本问题材料批判上的若干基本观点问题	171
二、重新检讨先秦有关资料	174
三、检讨《史记·老子列传》	183
四、就现行《老子》一书以考查其作者及其传承	189
帛书《老子》所反映出的若干问题	198
先秦名学与名家	207

一、名的起源问题	207
二、名的特别意义及孔子的“正名”思想	208
三、辩者与名家	212
四、公孙龙及《公孙龙子》	214
五、公孙龙的批判者	216
六、先秦“正名”思想的完成	218
七、名家的价值	221
释《公孙龙子·指物论》之“指”	224
一、各家解释略评	224
二、“指”字的一般用法	226
三、《指物论》的“指”字意义	227
四、庄子与公孙龙的纠葛	229
释《论语》的“仁”	
——孔学新论	231
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	
——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	248
一、二千年无确解	248
二、哥白尼的回转	251
三、思想史中的夹杂与“心即天”	255
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	260
释《论语》“民无信不立”	
——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察	264
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	270
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	
——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	282
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290
一、荀子政治思想中的儒家通义	290
二、荀子政治思想的特征	294

三、荀子政治思想对儒家精神之曲折	301
中国的治道	
——读陆宣公传集书后	306
王阳明思想补论	326
“清代汉学”衡论	336
一、“清代汉学”在时间上及精神上的界定	336
二、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向	340
三、汉代学术与清代汉学间之大疆界	355
四、清代汉学家在完全不了解宋学中排斥宋学	369
五、对宋学及清代汉学作“近代的”再评价	373
程朱异同	
——平铺的人文世界与贯通的人文世界	378
一、宋代理学的特征	378
二、朱元晦对程伊川思想的传承	384
三、二程的平铺的人文世界	392
四、朱元晦的贯通的人文世界	398
五、程伊川的一重世界与朱元晦的二重世界	402
六、朱元晦由实践与穷理,对形而上性的消解	406
答陈胜长先生“〈周官〉非古文质疑”	410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序

这里所刊行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是对“一般性的哲学思想史”而言，我所写的“以特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的想法，没有一部像样的中国哲学思想史^①，便不可能解答当前文化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有如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对现时中国乃至对现时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在世界文化中，究应居于何种地位等问题。因为要解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要解答中国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是枝枝节节地所能解答得了的。不过，因为近两百年来，治中国学问的人，多失掉了思想性及思考的能力，因而缺乏写一部好哲学思想史的先行条件，所以要出现一部合乎理想的哲学思想史，决非易事。于是，我想，是否在历史文化的丰富遗产中，先集中力量作若干有系统的专题研究，由各专题的解决以导向总问题的解决，会更近于实际？我之所以着手写人性论史，正由此一构想而来。这里所印出的是属于先秦阶段的。其中有的文献，虽可以断定是编成于秦代，但正如我在本书第十四章里所说，这些可以视作先秦思想的余波，所以我便一概称之为“先秦篇”。

① 近三十年来，有人以为西方哲学是以知识为主。若以此作标准，便认为在中国历史中并无可以与之相对应的哲学，于是把原用的“中国哲学史”的名称，多改为“中国思想史”的名称。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西方的所谓“哲学”，因人、因时代，而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希腊以知识为主的哲学，到了斯图噶学派（Stoic school），即变成以人生、道德为主的哲学；而现时哲学的趋向，除了所谓科学的哲学以外，也多转向人生价值等问题方面。则在中国文化主流中，对人生道德问题的探索，及其所得的结论，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哲学”。“思想史”的“思想”一语，含义太泛，所以我主张依然保留“哲学”一词，而称之为“哲学思想史”，以表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虽然由于知识之处理、建构，有所不足，但其本质依然是“哲学”的。在原用的“哲学史”中加入“思想”一词，不是表示折衷，而是表示谨慎。等于说，中国历史中没有“政治学”，因为没有建立成一套组织严密的“学的”系统，但却有丰富之“政治思想”，而可以由我们的努力，把它拿来作“学的”建立，有如从铁矿中炼铁、从铁中炼钢一样。

人性论是以命(道)、性(德)、心、情、才(材)等名词所代表的观念、思想为其内容的。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①。要通过历史文化以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文化中其他的现象,尤其是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只有与此一问题关连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比较深刻而正确的解释。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现象,有时会歧出于此一范畴之外,但这多属民族的自觉,因某些原因而暂归于堕退的时代。亦即是历史的发展,脱了轨辙的时代。历史的发展一旦恢复了正常,则由先秦所奠定的人性论,有如一个深广的磁场,它会重新吸引文化的各部门,使其环绕此一中心以展开其活动。这并不是说,我在此书里面,都直接解答了这些复杂的问题,而是说经过我的考查,发现这种密切的关连,乃是历史中的事实。在本篇中,对古代宗教是如何向人性论演进,提出了相当详细的解答。尔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依然是由人性论的磁性所吸收而始完成了它的转向。我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的文学理论,虽然出现得较西方为迟,但作为此一理论中心的“人与文体”的关系,却较西方提出得早一千多年之久。这种情形,也只有在中国文学的一般文化背景上,即是在人性论的文化背景上,才可加以解释。而我国的艺术精神,则主要由庄子的人性论所启发出来的。这都是很显著的例子。

二

我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应当追溯到殷周之际,所以我便从周初写起。胡适认为《尚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②,这大概不是常识所能承认的,尤其是对其中的周初文献而言。先秦虽百家争鸣,但总应以儒、道、墨三

① 请参阅《中国人性论史》第十四章。第十四章是一个结论,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概论。所以读此书的人,最好先从第十四章看起。

② 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二十二页。